

叙事重构与媒介嵌入：非遗纪录片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策略

郭 仪, 徐霄扬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 汕头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7日

摘 要

作为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视听传播媒介, 非遗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常常受制于文化折扣效应, 导致其作为高语境文化所承载的深层意义在传播中受阻。基于这一背景, 本研究立足文化转译视角, 探讨非遗纪录片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策略。研究发现, 叙事重构能够通过情感化叙事实现文化故事的共情传播、沉浸式叙事强化文化符号的具身体验、交互式叙事提升视听空间的认知共振, 而媒介嵌入能够通过分发差异化构建精准化的转译矩阵、形态小微化适配碎片化的转译场景、IP跨界化扩展更加立体的转译路径, 二者协同作用, 有助于强化非遗纪录片的文化转译效果, 提升其国际传播效能。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纪录片, 国际传播, 文化转译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and Media Embedding: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ocumentaries

Yi Guo, Xiaoyang Xu

Cheung K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Guangdong

Received: May 12, 2026; accepted: June 8, 2026; published: June 17, 2026

Abstract

As a key audiovisual medium for showcasing the unique charm of Chinese culture and building the nation's cultural soft powe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documentaries is often constrained by the "cultural discount effect", which hinder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profound meanings inherent in these highly contextualized cultural narrativ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study adopts a cultural translation perspective to explore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CH documentary dissemination on the global stage. The study found that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can achieve empathetic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stories through emotional storytelling, immersive storytelling reinforces the embodied experience of cultural symbols, and 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enhances cognitive resonance within the audiovisual space; meanwhile, media embedding can construct a precise translation matrix through differentiated distribution, adapt to fragmented translation scenarios via format miniaturization, and expand more multidimensional translation pathways through IP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The synergist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two approaches helps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effects of ICH documentaries and enhances their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effectiveness.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ocumentarie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Cultural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是具有地域代表性的表演艺术、工艺美术、知识技能、节庆仪式类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具有历史、文化、社会、科学或审美价值[1],是世代相传中华优秀品质的体现,是民族发展的根基与灵魂。随着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的持续推进,非遗纪录片逐渐成为中华文化出海的重要视听传播媒介。一方面,近年来非遗纪录片的作品数量、制作水准与技术手段呈显著繁荣态势。另一方面,其国际传播效果却未能与繁荣态势形成正向匹配,不少作品仍面临“看不懂、难共情、难扩散”的现实困境。这种“走出去”与“走进去”之间的落差,构成了非遗纪录片国际传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究其本质,这种困境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非遗所承载高语境文化特质与国际传播所面对低语境接受环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加之许多作品在叙事上带有说教色彩,在传播上依赖媒介形式单一、官方化的传统媒体渠道[2],导致许多富含中国哲学理念、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底蕴的文化内容,难以被跨文化背景的海外受众准确解码。尽管数智技术带来了全新可能,现有相关研究也在技术赋能视听语言创新与多模态感官体验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但仍缺乏进一步的追问和反思,即非遗纪录片如何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以更好地促进文化意义的传播、理解与接受。

2. 从文化折扣到文化转译

从文化属性来看,非遗本身具有高度的地方性、象征性与仪式性,其意义往往依赖特定历史经验和文化体验才能被充分理解。因此,在国际传播中,这一高语境文化无法避免理解门槛与意义损耗的现实

问题。即便是纪录片这种具有较强真实性和说服力的影像类型, 其国际传播效能也有赖于复杂的意义转化与跨文化传播过程。

关于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受到阻碍的现象, 早期的相关研究多引用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加以阐释。例如, 高峰等学者认为, 有效的编码策略才能避免误读, 并超越文化折扣和语境因素, 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传播[3]。陆敏等学者认为, 由于历史地理知识的缺乏或语言文字的屏障, 部分海外观众对我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理解出现了文化折扣, 甚至可能折射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知识沟”[4]。孙丽青学者认为非遗题材纪录片的制作面临着缺少非遗项目全方位展现、年轻化表达策略运用不足、跨文化传播存在症结、市场发行存在制约等问题[5]。这些论点同样适用于非遗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此外, 弗朗西斯·李(Francis L.F. Lee)提出媒介内容在跨文化传播时往往会以“特定于本地”的方式被接收与重构[6], 其还进一步指出, 当媒介内容具有高度的文化特性时, 容易导致较高的相对文化折扣以及跨文化表现可预测性的下降[7]。以上相关研究从文化差异、认知框架与接受语境等方面揭示了非遗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受阻的原因, 为分析其国际传播困境提供了重要参照。

然而, 相关研究侧重于把文化折扣描述为一种现象或效应, 并认为其有助于诠释纪录片等文化产品在国际传播中为何难以被理解, 但未能充分回应其文化意义如何被理解。也就是说, 一方面, 相关研究强调对文化折扣的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 但未能很好地回应如何在国际传播中处理这种文化折扣或差异。另一方面, 相关研究虽然把文化折扣归因于文化距离, 但是对文化意义如何重新编码以及再生产的机制缺乏深入阐释。概括而言, 当非遗纪录片国际传播问题被归因于难以消解的文化折扣时, 其传播过程本身所蕴含的调节空间往往被忽视。从这一视角来看, 非遗纪录片国际传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已不仅是文化折扣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一传播过程中通过有效策略完成跨文化意义的转译。因此, 立足文化转译视角, 有助于把研究重点从静态的文化差异转向动态的文化意义生成过程。

“转译”一词源自语言学, 指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转译一词最早由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于1994年提出, 他认为全球文化具有跨国性和转译性[8]。2001年, 保罗·邓肯姆(Pau Duncum)提出了“文化转译”的概念, 并认为其是将一个国家的文化以其他国家可以理解的方式传递给该国受众的过程[9]。此外, 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认为目的语在转译过程中应准确表达源文本的信息, 同时也要传递文化内涵[10]。因此, 非遗纪录片国际传播的文化转译也并非简单语言转换或符号替换, 而是指文化内容在不同文化语境的重构与调适, 以实现文化意义的深刻理解和情感共鸣。

在这一框架下, 非遗纪录片国际传播的文化转译将贯穿于其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全过程。若从传播实践的运行机制出发, 其重点聚焦于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在内容生产过程中讲述与呈现文化意义, 二是如何使这些文化意义在具体媒介环境中更易感知、理解与接受。从非遗纪录片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策略来看, 前者重点指向叙事层面的意义建构, 即叙事重构, 而后者主要涉及传播层面的差异化供给, 即媒介嵌入。

3. 叙事重构: 情感化、沉浸式与交互式叙事

“叙事”, 即叙述故事, 包含“叙”(行为)和“事”(内容)两个方面[11]。传统的叙事往往沿袭着固定的套路和模式, 限制了创作的可能性。叙事重构是指通过对故事元素的重新组合和置换, 创造新的叙事模式和结构。数字技术的兴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叙事的方式、结构、体验和传播, 还极大地扩展了叙事的边界与可能性。

具体到非遗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中, 叙事重构能够通过情感化叙事强化文化故事的共情传播、沉浸式叙事实现文化符号的具身体验、交互式叙事提升视听空间的认知共振, 这种由表及里的策略, 有助于从故事结构、文化符号、视听空间三重维度, 将高度情景化的非遗内容转化为海外受众更易理解与接受的数字媒介形态。

3.1. 情感化叙事：实现文化故事的共情传播

故事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关键来源，人类通过自己所了解到的故事来感知世界。而文化故事则是特定文化经验、价值观念与历史记忆在叙事形态中的集中呈现。具体而言，非遗文化故事由高度情境化的历史经验与象征意义构成，让受众难以译读，传统宏大叙事容易引起海外受众的抵触情绪，因此需要一种更为普世的能让受众理解的叙事方式来讲述非遗文化故事。而人类能够在共情的体悟之中达到理解[12]，情感内容的传播是共情的催化剂。因此，非遗文化故事应运用情感化叙事，帮助受众完成对文化故事的情感认同。

共情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是一种无意识的情感反应。在共情作用下，人们能够调动自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生活经验和认知基模等综合感知，有助于人们在看待事物时学会转换不同的立场，进而在情感、态度和行动等层面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情感。具体到跨文化传播，情感能够作为桥接不同文化的连接点。共同情感是人们基于相似的情感体验，感受他人情感意义而唤起的具有共通性特质的情感，其为识别、阐释和理解相互间的情感表达与情感意义提供背景[13]。要让受众达到情感共鸣，需要对叙事文本的选择与呈现加以把关。传统非遗纪录片宏大叙事的理解依赖大量文化知识背景，海外受众容易感到接受困难。因此在非遗纪录片的情感化叙事当中，可以通过聚焦传承人个体命运、日常生活等，将文化命题中蕴含的梦想、坚守、爱与冲突等普世人类情感呈现出来。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可以消弭国家和文化的边界，连通“自我”与“他者”，实现文化交流、价值传递和意义共享。例如《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了不起的匠人》(2016)、《如果国宝会说话》(2018)等纪录片都放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而镜头呈现工作日常与生活片段等等。具体而言，《我在故宫修文物》采用大故事中的小叙事策略，聚焦文物修复师的个体工作经历与内心情感，以平民化叙事视角和日常化表达呈现修复过程，截至2020年11月，该片在bilibili播放量接近800万次，弹幕超过11万条，豆瓣评分高达9.4。在YouTube平台上，海外观众以英文字幕追更，评论区常见这才是文化输出等正向反馈。《了不起的匠人》则将镜头对准极具匠心的亚洲匠人，每集15分钟展示一门手工技艺的制作过程与传承人的日常生活，豆瓣评分8.6，创下接近6900万的优酷纪录片历史最高播放纪录，节目同名微博话题总阅读量近5亿，总讨论量超过20万；该片随后反哺卫视播出并被华策买断海外发行版权，涵盖英语、日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种版本。《如果国宝会说话》每集5分钟让文物“开口”讲述自身故事，豆瓣评分高达9.5，央视网视频播放次数达8329万多，独立访问人数达5981万多，海外社交平台浏览量约100万次；在YouTube平台上，来自希腊、埃及等不同国家的观众评论称“作为希腊人看懂了中国的美”“埃及文物也该这样讲故事”，甚至有法国网友主动为其他国家观众解释“何尊里的‘中国’不是现代China”，这一自发性的跨文化解释行为，恰恰印证了情感化叙事对文化障碍的消解作用。这种存在于人类情感中的共情，是情感联结的纽带，在传播效果层面实现文化故事的共情可以减少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障碍。

从叙事层面来看，情感化叙事之所以能够激发文化故事的共情传播，关键在于其重构了文化故事的叙事重心与表达方式。情感化叙事更强调以情感为叙事核心，将非遗文化置于个体日常生活中。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故事通过展现人物的情感状态、行为动机与生活情境，使受众通过对其中人类共同情感的感知与认同，从而慢慢进入到文化故事的叙事情境中。因此，受众能够在情感共鸣中建立起对文化内容的理解基础，从而实现文化故事的共情传播。

3.2. 沉浸式叙事：强化文化符号的具身体验

文化符号是中华文明标识的核心载体，然而，其精神内核的抽象性与历史语境的限定性，往往导致跨文化解读时出现意义损耗[14]。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受众缺乏直观感知与情境体验，所以很难深入理解文化符号背后的深层含义。但好在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新

兴技术, 为重塑文化符号感知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具体到非遗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中, 这些技术应用推动了叙事模式从传统的观看转变为具身体验, 增强了受众对文化符号的感知。

传统纪录片通常依赖解说词来解释文化符号, 可语言本身对于海外受众就是一道门槛。相比之下, VR 技术能够构建出具身化的体验场景[15], 通过全方位刺激受众的视听感官, 使其身临其境地融入到非遗场景之中[16]。这种由技术构建出的具身体验, 可以帮助弥补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局限性, 将海外受众对文化符号的感知由语言层面转向感官编码层面, 通过非语言通道, 将文化符号内化为情感和审美体验。这种直达感官的叙事重构策略, 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更高的接受度, 能够增强海外受众对文化符号的当下感与情感投入, 从而激发对文化内容持续的理解兴趣。例如, 我国首部 VR 非遗纪录片《昆曲涅槃》(2019), 该片并没有采用传统叙事方式, 而是通过语言去解释昆曲的程式化动作、服饰、舞台的象征意义, 利用 VR 技术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江南园林的实景戏台之中。通过头显设备的自由视角, 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演员的眼波流转、水袖轻扬, 聆听环绕立体声中的笛箫吟唱, 这提供了一条不同于传统语言的认知路径, 它直接激活受众的感官与直觉, 在体验中建构对昆曲写意之美的理解。在这里, 非遗纪录片运用新技术, 针对受众的视觉、听觉等感官下手, 将原本抽象的、需要大量背景知识才能理解的文化符号, 转变为一种具身化体验。

由此可见, 沉浸式叙事对文化符号意义生成方式进行调整, 将对非遗文化理解的路径由单纯地凭靠语言解释转向主体沉浸式参与, 使文化意义不再只依赖概念说明, 而是在空间体验与感官互动中自然生成。观众通过身体在场与环境包裹, 获得对文化氛围、审美节奏与价值意涵的整体感知, 从而在体验过程中完成对文化符号的主动建构。沉浸式叙事因此重塑了文化故事的感受方式, 为非遗文化的理解提供了更加直观而立体的路径。

3.3. 交互式叙事: 提升视听空间的认知共振

在传统纪录片叙事中主要依赖线性的叙事结构, 受众以相对被动的方式沿既定路径接受信息与理解内容。这种单向的传播模式往往难以调动受众的认知参与, 文化意义的理解容易停留于表层。视听空间能为受众交流文化提供讨论场所, 且随着数字媒介环境下的发展以及交互技术的引入, 纪录片叙事逐渐由单向传递的线性叙事转向交互式叙事。

这类叙事不同于传统的“传-受”单向关系, 交互可以赋予用户能动性[17], 使受众从被动的观看者转变为主动的意义协作者。这种转向的核心目的, 在于通过用户的深度参与, 实现跨文化传播中的认知共振。所谓认知共振, 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在互动参与中形成对同一文化对象的理解同步与意义响应, 即在共同的问题意识与解释路径中产生相对一致的认知节奏。它并非情绪感染式的共鸣, 而是通过参与式理解所形成的认知协同。

交互式纪录片能够利用通用语注释和交互触发机制来帮助受众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含义。在多语种网页交互式纪录片中, 通用语(通常为英语)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工具, 更是连接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受众的认知中介。非遗纪录片往往包含大量方言、生僻术语或特定视觉表达, 直接展示容易造成海外受众的认知断裂。而交互式纪录片能够利用通用语注释和交互触发机制来帮助受众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以交互式纪录片《无形的占领之墙》(The Invisible Wall of Occupation, 2017)为例, 其希伯来语涂鸦对于非希伯来语的用户而言只是无意义的图案。但当用户点击或悬停时, 右上角即浮现英文释义及背景补充, 交互设计能将其转化为可探索的认知节点, 用户通过触发解释, 自主完成意义解码, 这构成了认知共振的理解基础。该片在多语交互上的实践, 对非遗纪录片如何处理方言、生僻术语等高语境符号具有启示意义。

在此基础上, 除了通过解释来降低文化认知门槛, 交互式叙事还可以通过将受众引入意义共创过程之中, 从而达到认知共振的效果。在以互动与回应为特征的交互式叙事形态中, 海外受众可以通过平台

围绕纪录片内容展开理解与讨论。部分交互式纪录片通过评论、分享与素材提交等方式,构建讨论空间,形成持续的交流场域。在这一过程中,受众能够在交流碰撞中产生彼此之间的认知共振。从被动接收到主动参与意义共创的转变,既是认知共振的核心体现,更标志着传播从单纯的信息推送变为意义共生。例如,国际交互式纪录片《新生活》(NEW LIFE, 2013)通过受众的讨论、分享与经验回应,扩展纪录片的叙事边界,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得以在互动中表达中增进对文化意义的理解。

综上所述,交互式叙事在非遗纪录片中的运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通过触发交互机制来复制文化意义的认知;二是通过开放讨论与内容共创,促使受众参与意义建构。这两种机制共同帮助受众达成对文化含义的认知,从而在视听空间中实现更为稳定的认知共振。

4. 媒介嵌入: 分发差异化、形态小微化与 IP 跨界化

在多平台并存、媒介机制高度分化的传播环境中,纪录片的传播已不再依赖单一渠道或稳定路径,而是嵌入于不同平台的技术规则、内容形态与使用情境之中。对于非遗纪录片而言,其传播过程应在多重媒介环境中进行分发、组织与呈现。具体而言,在非遗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中,媒介嵌入能够通过分发差异化构建精准化的转译矩阵、形态小微化适配碎片化的转译场景、IP 跨界化扩展更加立体的转译路径,这种根据不同媒介平台与传播机制重新编码的策略,有助于构建兼具广度与深度的国际传播矩阵策略,使非遗内容更好地进入海外受众的接受情境。

4.1. 分发差异化: 构建精准化的转译矩阵

现今社会发展下,媒体融合之势越发明显,观众可以选择的收看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其观影终端渐渐转向更加便捷的 PC 端及手机移动端。不同媒介平台拥有偏好不同的用户群体、内容调性与算法逻辑,因此非遗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不再适用于统一的分发方式,而需要基于平台的差异来实现精准且具有针对性的分发。在这一过程中,传播主体要准确把握不同平台受众的用户使用习惯以及接受情境,改变单一的分发思路,根据平台特性对同一非遗纪录片内容呈现形态进行更改,从而在多平台并行的传播结构中构建起精准化的转译矩阵。

在具体的分发操作层面,主要体现在内容形态与平台机制之间的适配过程。比如非遗纪录片在标题设置、关键词选择、视频时长、节奏控制与互动设计等方面,都需要依据平台的推荐机制进行调整,从而提升内容与平台之间的适配程度。当传播主体发挥不同媒介的特点和优势时,便可以实现信息传播效果的最大化[18]。例如,作为面向海外市场的系列纪录片,《四季中国》(2019)由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出品,由英国主持人江森海主持,采用外籍主持人视角以西方思维体验二十四节气,降低了海外观众的理解门槛。摄制组历时两年跨越全中国 24 个省(区、市),积累了 1500 小时高清拍摄素材,在每个节气当天准时播出对应集数,被观众称为“节更”。该片在 YouTube 平台发布完整的叙事形态,以契合该平台用户对长视频精品内容的消费习惯。而在 TikTok,则需将非遗内容转译为节奏更加明快且强调工艺细节的短视频,并配以流行音乐与视觉特效,来适配该平台用户的碎片化观看习惯。这种平台之间存在的分发差异,能够深度地去适配各种不一样的传播环境,也就意味着非遗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实践,需要放弃一刀切的广播思维,而是重视并融入不同的平台环境,实现内容在多层次、多维度方面的传播。此外,非遗纪录片还可以借助数据反馈,通过监测用户互动与反馈对内容的分发进行动态优化。所以,分发差异化通过多平台间分发不同的内容形态,来重组整个传播路径,从而形成更加精准的转译矩阵。

4.2. 形态小微化: 适配碎片化的转译场景

在当下的数字化媒介环境中,传播内容更多呈现为碎片化的信息片段[19],受众的媒介接触更多发生

在那些零散、碎片的使用场景里面。这种以碎片化时间和注意力为特征的媒介使用方式,改变了受众对视听内容的接收节奏与理解路径。在这一背景下,非遗纪录片的传播形态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长视频形态,而是应该转向形态小微化,通过调整内容结构,来适配多元的碎片传播场景。

传统非遗纪录片往往以深厚文化阐释为核心,叙事密度高,内容理解依赖连续观看与背景知识积累,容易在碎片化使用情境中造成理解中断。而传播的有效性取决于受众能否译读信息[20]。面对这一问题,形态小微化运用短平快的表达方式,打破非遗文化原有的高语境壁垒,将厚重、密集的文化叙事转化为轻量化、易解码的叙事单元,使受众能够在碎片化的条件下完成基本理解。在数字时代下,微纪录片便是形态小微化的一种展现形式。例如《中华百工》(2022)以每集5分钟的形式,选取拥有悠久历史、丰富文化以及可传承的非遗项目,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从非遗的保持价值来探索非遗的生命力。作为系列样片的《中国宣纸》一集,由《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执行总导演任长箴执导,呈现宣纸制作中捞纸到晒纸再到剪纸的完整工艺流程,视频发布后海外新媒体浏览量迅速突破百万。美国网友 Lucia M Yu 留言:“中国书法艺术就离不开宣纸,这种纸张价格昂贵”;尼泊尔网友 Ajit Nair 评论:“这种止于至善的追求和规模非常惊人,对这些工匠和他们的作品致敬”。通过这种内容形态的小微化、趣味化呈现,厚重的文化得以潜入受众的碎片化场景,实现润物细无声的隐性传播。进一步来看,形态小微化的作用不止于时长缩减,而在于重新组织受众对文化内容理解路径。通过将宏观文化主题拆分为可独立感知的微叙事单元,如手艺人日常片段、技艺动画化细节或仪式流程的局部场景,非遗纪录片能够引导受众在多次、分散的碎片化媒介接触中逐步理解非遗文化内容。

4.3. IP 跨界化: 扩展更加立体的转译路径

在媒介融合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单一文本形态已难以承载复杂文化内容的多重呈现,IP 跨界逐渐成为内容在多媒体环境中延展的重要方式。优质的 IP 形象能够作为价值输出的有效载体传递文化内涵和价值导向,从而让消费者产生对文化产品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21]。同时,高质量 IP 具备跨媒介迁移的能力,可以在电影、游戏、动画等多种载体之间实现多维传播,从而为文化意义提供更加立体的转译路径。

非遗纪录片应自身通过系列生产与内容组织,逐步打造具有识别度和延展力的非遗文化 IP。通过在纪录片叙事中反复强化核心人物、技艺形象或文化主题,并在后续传播中不断向动画、展览、文创产品及互动体验等领域延伸。这种以非遗纪录片为原点的 IP 跨界联动,有助于推动非遗文化由单一文本走向多元场景,在国际传播中构建更加广阔而立体的转译路径。与此同时,除自主构建非遗 IP 之外,也可以借助已有的成熟国际 IP 进行跨界扩散,让受众得以在多重媒介体验中更为系统地理解非遗的文脉、符号内涵和价值,形成完整的文化场域[22]。例如纪录片《流光拾遗之旅》(2023)将非遗技艺(如剪纸、皮影)巧妙地融入《原神》(2020)这款游戏的世界观和角色设计之中,并通过游戏这一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媒介进行传播。在媒介分发路径上,该系列纪录片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非遗处指导,制作了 15 种语言字幕版本,在 YouTube 等全球社交平台及视频网站发布,迄今已播出 7 期,海内外总播放量近 4000 万次,其中海外社交平台 X(原 Twitter)的总阅读量超过 1400 万。该片在超过 200 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发布仅 3 天全网播放量就已超过 400 万,海外网友纷纷评论:“木版年画上嵌入了数量如此惊人的细节,而且都是手工完成的!”“米哈游利用游戏的影响力来促进和保护中国文化,并与世界其他地方分享,这真是太酷了”。对于全球玩家而言,他们首先接触的是其热衷的游戏角色和精彩故事,非遗元素是作为游戏审美体系和世界观中的一部分被逐渐接受的。这种媒介嵌入策略在弱化非遗文化他者感的前提下,将非遗元素融入既有的全球流行文化语境之中,使得非遗文化意义在跨文化传播中更好地进入受众的接受情境。所以无论是以纪录片为原点逐步培育非遗文化 IP,还是依托已有的成熟国际 IP 实现跨界扩散,核心作用都在于打破单一文本的传播边界,扩展为更加立体的转译路径,使非遗内容在媒介环境中能够有更多途

径让海外受众接受。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文化转译视角,系统论证了非遗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如何通过叙事重构与媒介嵌入策略,促进文化意义的理解与传播效能的提升。前者侧重于通过情感化、沉浸式与交互式的叙事重构方式促进对文化故事的情感共鸣、文化符号的具身体验以及视听空间的认知共振,为非遗纪录片跨文化传播提供更具转译潜力的叙事方式。后者通过分发差异化、形态小微化与IP跨界化,推动非遗纪录片嵌入不同的媒介环境中,帮助非遗内容构建起精准化的转移矩阵、适配碎片化的转译空间以及扩展更立体的转译路径,以此更好地进入受众的接受情境。叙事重构与媒介嵌入两大策略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呈现出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结构关系。二者的协同作用,有助于强化非遗纪录片的文化转译效果,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然而在当代数字媒介环境中,技术的应用可能会伴随信息茧房、内容浅表化及数字鸿沟等问题。所以非遗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实践在技术应用中需保持人文自觉,警惕技术理性对文化内核的消解。展望未来,非遗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有待超越单纯的形式创新与渠道扩展,应确立以文化转译为重心的传播思路,将非遗文化转化为更易被不同文化语境理解和接受的表现形式,促进受众对非遗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并在更广阔的跨文化交流中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价值互鉴。

参考文献

- [1] 杨红.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4.
- [2] 吴冠东. 中国非遗纪录片在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的传播策略分析[J]. 新闻传播, 2025(17): 31-34.
- [3] 高峰, 赵建国. 中国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与超越[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09(3): 81-84.
- [4] 陆敏, 陈燕. 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共享、文化折扣与解读偏移——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海外观众解读的分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12): 65-69.
- [5] 孙立青. 非遗题材纪录片制作的文化价值、发展症结与突破路径[J]. 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 2024, 27(6): 28-33+83.
- [6]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207/S15327736ME1904_3
- [7] Lee, F.L.F. (2008) Hollywood Movies in East Asia: Examining Cultural Discount and Performance Predictability at the Box Offic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8, 117-136. <https://doi.org/10.1080/01292980802021855>
- [8] Bhabha, H.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54.
- [9] Duncum, P. (2002) Clarifying Visual Culture Art Education. *Art Education*, 55, 6-11. <https://doi.org/10.2307/3193995>
- [10] Bassnett, S. and Lefevere, A. (1990)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13.
- [11] 马全福. 视觉传达设计叙事策略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艺术学院, 2018: 27-35.
- [12] 吴飞. 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26(5): 59-76+127.
- [13] 王真真, 王相飞. 共情传播视域下中国体育故事跨文化传播的国际认同建构[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4, 40(1): 97-104+126.
- [14] 喻国明. 跨文化交流中的三个关键性传播节点——关于减少和消除“文化折扣”的传播学视角[J]. 新闻与写作, 2020(3): 62-65.
- [15] Kim, J. (2021) Synthetic Vision in Virtual Reality Documentaries. *Film-Philosophy*, 25, 321-345. <https://doi.org/10.3366/film.2021.0178>
- [16] 高文谦. 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文化缺失与优化策略[J]. 传媒, 2024(11): 67-69.
- [17] Gaudenzi, S. (2013) *The Living Documentary: From Representing Reality to Co-Creating Reality in Digital Interactive Documentary*. Ph.D. Thesis,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 [18] 刘静. 中华传统文化类微纪录片的跨媒介叙事研究[J]. 当代电视, 2025(11): 64-68.
- [19] 沈海涛. 数字叙事赋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逻辑机理与优化策略[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174-182.

-
- [20] Hall, S. (2014) 1980[1973]. "Encoding, Decoding".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1979*, Ed. by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128-138. London: Routledge. In: Angermuller, J., Ed., *The Discourse Studies Reader: Main Currents in Theory and Analysi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12-121. <https://doi.org/10.1075/z.184.211hal>
- [21] 杜小峥. 河南红色文化 IP 塑造和传播力提升研究[J]. *新闻爱好者*, 2023(10): 92-94.
- [22] 樊传果, 李旭丰. 非物质文化遗产 IP 的跨界营销传播探析——基于传统美术类非遗的视角[J]. *传媒观察*, 2022(12): 85-90.